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潘光旦短评集



潘乃穆

潘光旦
潘乃和 著
编 著

(下)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潘光旦短评集

SHORT REVIEWS BY PAN GUANGDAN

下

潘光旦 著
潘乃穆 编



潘光旦
(1899—1967)

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
1941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两个爱自杀的民族

近来德国与日本自杀之风又盛行一时，报纸上随时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记载，不是关于德国的，便是关于日本的；聪明一些的外电编辑有时便把两国的消息放在一起，例如在五月九日的《时事新报》上，我们便读到这样一个标题：“德日两国自杀之风流行于时——德国自杀者多系闻人——日本三原山僧众骗妖。”

德、日两民族自杀案件的众多，是一件早经公认的事实。有一部分研究民族品性的学者还曾经给它一个解释，认为是民族性相同的一种表示，甚至承认这种民族性有显明的生物学的根据。

不过在今日之下讲起德、日两个民族都有自杀的倾向，我们实在可以有狭义的与广义的、或事实的与比喻的两种看法。报纸上所再三发表的不过是狭义的与事实的自杀罢了。还有广义的与比喻的咧。日本近年来的穷兵黩武，外则对于邻邦的侵略，内则武人的跋扈飞扬，异己的排斥，思想的压迫，青年的禁锢，在在似乎是向着自杀的一条路上走去。欧战后的德国，创巨痛深，总算韬晦过一时，但最近自国社党得势，它所采取的种种政策，竟和日本军人的在原则上并无二致。对内对犹太人与共产党人的压迫，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外，当然因为《凡尔赛和约》历年来束缚的结果，又因为邻国的监视，尚不能多所施展，但是那种跃跃欲试的精神，和欧战以前的很有几分相像。它如大学生公开械斗的恢复，教会团体“上帝偏袒德国人”(Gott mit uns)的呼声，在在也都证明它的前途也并不是一条康庄的活路。德、日两个民族，欧战以前本来很相像(日本维新，在在

取法于德),欧战后的几年里,稍稍差异了一些,最近又越来越相同了。最有趣的是,日本明明没有犹太人的踪迹,而日本的军人也做了一次“反犹太”的表示,说国联原是犹太人想出来的把戏;日本人的退出国联,是暗中受了犹太人的阴谋的胁迫(四月廿四日,《字林西报》)。真是湖北老所说的“见鬼”?一个人到了“见鬼”的程度,迟早要出毛病,也许一个民族也不免同样的下场吧。

(原载《华年》第2卷第20期,1933年5月20日)

卫礼贤与中国学院

德国曼因河边的法兰克福大学,为研究中国文化及相互介绍中、德两国文化起见,于一九二四年设立了一个中国学院,至今将近十年,已成欧洲研究中国文化比较最完备的一个学府。最近该学院又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国学院友谊联合会。关于中国学院创立经过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当时报纸已经有过一番记载(例如四月十日的《时事新报》),可不赘。但是要领会该学院的研究精神,我们先得对于创办人卫礼贤博士有一番认识。

卫礼贤先生是德国派到中国来的一位传教师,可是来华二十五年之后,他不但没有替人行过一次洗礼,自己却变作一个中国民族与文化的鉴赏大家。他把许多中国的关于思想方面的书译成德文。不久以前他的儿子又到中国来,预备在北平继续他父亲所未竟的一部分工作。卫氏又做过好几本关于欣赏中国文化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中国的灵魂》,书评家说是关于中国的“最正确也最深刻的一本评论,其正确与深刻的程度要远在一般论中国事情的著作之上”。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一句过誉的话。

卫氏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出它是一个整个与囿囿的东西,惟其是整个的与囿囿的,所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此种价值不在西洋文化的以下。这一点,在西洋学者中,德国学者原是最能认识的,不过卫氏尤其能心领神会。中国学院的关系人向

新声社记者的谈话里就说起当初莱勃尼兹(Leibnitz)与歌德(Goethe)便因中国文化的初步的认识而悟到世界文化的总括性与伟大性;又说莱勃尼兹本想在今日的北平创立一个学院,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并行,并且依照科学院的工作方法,来研究与介绍东方一切文物。可见所谓囿囿性的认识,在卫氏以前的德国学术界,早就有相当的历史了。后来卫氏的创立中国学院,也就引这种认识做根据。

根据上文的一点认识,卫氏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又产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一是能于一切熙熙攘攘、甚至于混乱的外观的局面之后,看出中国文化的恬静与秩序来。一个有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自有它颠扑不破的所在,西化东渐的结果,也许在外观上引起了不少的骚动,但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中心,论情论势,一时该不会有多大变化。这层卫氏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说:“在极大的混乱中间,日常生活依然能安然的进行着,并没有多大阻滞,即此一点,对于新到中国的人,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所造诣的程度。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受禁止的。你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可是生活依然是静悄悄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第二是不赞成操切的改制。卫氏讲起戊戌变政以后的种种设施,尤其是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有一次说过这样的几句话:“这个时候,便开始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时期。变法的上谕一道一道的从宫中出来。旧日用考试方法的选举制度也被推翻了。几千年来从民众中间产生政治人员的一大筛子就算从此摧毁。各地都准备开办西式的学校。全国政治的结构也准备着采取西洋的成式。结果是——一般的惊惶失措。”

第三是不赞成两种不相同的文化胡乱的混合,尤其是在艺术的一方面。卫氏有一次经过改建后的黄鹤楼,禁不住说了许多气愤的话。他说:“这新建筑真是奇丑,不但自己丑,把四围的风景都给带累了。造成这件怪物的工程师对于中国艺术,原有很好的了解,谁知道他惑于西洋建筑的一知半解,把西洋建筑里最丑陋、最粗俗的成分都给引了进去,结果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混合物,浅薄、下贱、破碎,把

当地的文化给从根破坏了。”

第四是不赞成思想与信仰的整个的替代,尤其是带有强制性的替代。许多人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可以说都没有多大理由。可是卫氏在华日久,对于中国的民族性与文化,有亲切的体会,所见便要比一般人高明得多了。基督教的教义,无论对于中国如何有利,只要给那班心切于求、目眩于观、存心虽好、眼光却近的传教师或社会工作人员热烈的宣传以后,就会弄得很糟,卫氏说得好:“但只要你能用人的道理来接待他们,并不想在他们身上占到什么利益,例如金钱或劳力之类,更不想为了他们生命的永久的得救,劝诱他们进一个外国的组织,做一个信徒,你就可以发见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民族比中国民族还要来得和气、忠实、和喜欢交接朋友的了。要晓得钱财和劳力的侵略对于他们固然是一种不欢迎的事,信仰的剥夺与强制替代,尤其是一桩痛苦。”

这几句话真是慨乎言之。有几个教士和宗教工作人员明白得这一点的。最近实际上被长老会开除的贝克夫人大概要算不可多得的一个了。显而易见卫氏是最能体会到基督教经典中所云“安息日因人而设,不是人因安息日而设”以及中国儒家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两句旧话的。我们到此才了解他为什么在二十五年之内,不但没有给人家施过一次洗礼,自己反而变做一位以“弘”中国文化的“道”为职志的人。

中国学院是卫氏一生努力的最后的结果,我们相信在它未来的发展里,一定能表现像卫氏一生所表现的同样的精神。

(原载《华年》第2卷第20期,1933年5月20日)

妥协的真条件

日来和日本和平解决的气氛极浓厚。所谓和平解决,说得不好听些是妥协,说得好听些是“在相互谅解下求和平”,其实都是一件事。这一件事,当局似乎早想做而没有做,没有做的原因一则怕民众

反对,尤其是怕西南;再则没有料到日本会这样肆无忌惮的进逼,满以为有了国联的靠山,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等到看见这件事非做不可时,敌机已经到了北平。

其实我们始终看不出为什么这件事做不得。打不过人家,是一桩事实;打不过而勉强招架,势必至于闹到全局糜烂,也是谁都可以见到;一时忍辱的屈伏是民族间数见不鲜的事,尤其是在中国的历史里。不过做这件事有两个条件。第一,当局的眼光与胆量要远大。眼光远,才会看出妥协后还有办法;胆量大,才敢冒一时的不韪来领略民众的唾骂。这两点,以前没有;在锦州议设中立区的时候,也只有其一。现在怎样?第二,大家要有振作的力与信。城下之盟的耻辱小,盟后犹不知振奋的耻辱大,以往我们不过在不甘妥协的高调里看见一些慑于小耻之心,却没有在实地努力的成绩里看见什么惕于大耻之戒。今而后又怎样?妥协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这两个条件。

(原载《华年》第2卷第21期,1933年5月27日)

航空救国奖券

西人艾某把他的房屋、地产、以及古玩,资助我国,充作推广航空救国运动之用。对于这种义举,在这航空救国的声浪洋溢的时候,自然是谁都不免歔歔嗟叹,认为得未曾有。独有实业界领袖穆藕初先生是一个例外。穆先生最近写了一封信给王晓籁先生,信中始则指出艾某以销售军火起家;再则发见他在缘起中所说的话前后不无矛盾;三则怀疑艾某的地产、房屋、与古玩究属值得几个大钱;最后又提出了“不可解”的三点,请王先生加以研究后,再行出头号召(二十二日,《时事新报》)。

我们对于这件事的见地,和穆先生的完全一样。我们根本就怀疑航空救国的名词和运动,我们在这个题目上先后已经说过两次不中听的话。其次我们反对用奖券的方法来提倡任何公众事业,我们以为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一些利益,无论多大,总是抵不过它所唤起

的那种侥幸和孤注一掷的心理。我们更可以进一步的说,几十年来国事的一无办法,这一类心理要负很大的责任。关于这一点,我们至少也讨论过一次(《寻开心的救国与想发财的善举》^①,第一卷,第卅八期)。如今一个以贩卖军火起家、一个为富不仁的外国人,要在这不景气的当儿,阳借义举之名,阴行出脱一些旧货之实,而所谓义举,又是恰好我们始终认为是有疑问的,我们唯一的责任,是要为那些为公热心与为私热心的人泼上一些冷水。

(原载《华年》第2卷第21期,1933年5月27日)

医学常识

《大公报》的第一百九十期(五月九日)的《医学周刊》里论到国府委员的医学常识,说某委员近在北大医学院演讲,说了不少十分外行的话,例如,表、泄、吐是治疗的大法,老年人消化力弱,故牙齿脱落,以免多食不易消化之物等等。但是医学常识原是比较不容易取得的一种常识。即就医师而论,我们有时也会发见一些违反常识的论调。我们有一次在《申报》的《医药周刊》(三月二十七日)里读到某医师的一篇言简意赅的文章,题目叫做“贞操与血统问题”。这位医师以为贞洁的观念,可以分做两部分,贞是伦理的,洁是生理的。再嫁的女子既失诸不贞,尤失诸不洁,而不洁的缘故是因为“前夫的浸润”。他说:“再嫁之女子,其血统至为不纯,盖其前夫之浸润,得永久而不泯,一度受胎之后,其夫之浸润已深,虽再嫁他人,而所生之子,仍有酷似前夫之雅。是在遗传学上谓之‘异父遗传’,又曰‘浸润遗传’,其血流之不纯,可不言而喻。……然则古人禁止再醮之义,或即根于生理之观察欤?”这是什么话?某医师大概最近翻阅过一两种西洋极陈旧的遗传学书籍,看到了其中所谓“前夫感应”西文叫做 *telegony* 的一段神话,才有这一番维持风教的议论。他在那篇

^① 见本书上文。——编者注

文章里既有“至其当否，则有待于治遗传学者之研究”的谨严的语气，我们不妨很直截爽快的告诉他：这一类的神话，好比孕妇见不得兔子等等，遗传学者从来就没有认为有研究的价值。我们平日总以为医师们对于这种极粗浅的生理常识是有充分的准备的，如今忽然发见不但没有准备，且根据了一些谬误的见解，从而发为社会的议论，真有些不可思议了。我们为常识故，不能不辩，为许多可以再醮的妇女计，尤不能不辩；为缺乏医事常识的国府委员的盛名打算，似乎更有一辩的必要。

（原载《华年》第2卷第21期，1933年5月27日）

一个搔着痒处的演讲

近来有一个西人，译名叫做傅有任博士，陆续在西区德国学堂里演讲，总题是《中国的复活》；分题之一是《以往的中国》，大概说历史上使中国民族陷入目前的困难之境的根本原因有三。第一，古来中国气象与地理的影响，使民族养成一种容易和精神事物发生关系、而难与物质事物发生接触的习惯。第二，中国旧教育太重记性，而不重悟性，太重记忆的结果是妨害了脑经的真正的运用。第三个原因就是跟着一、二个原因而来的。因为身体不容易和物质的事物接触，又因为偏重记忆的用脑方法，民族分子的感觉能力便日就衰败，此种能力衰败的结果，使一切生活或工作计划的规定与施行，都不能澈底。

我们不认识这位傅博士，我们也没有来得及亲聆他的演讲的全部，我们不过在日报上（五月十九日《申报》）读到他讲辞的一些大纲。但是即就这极简略的大纲而论，我们觉得他已经搔着了一些痒处。研究一个民族的盛衰隆替，不外下面的几种下手方法。最粗浅的是责备一时的境遇，例如，近年来一部分人的痛骂帝国主义。稍进一步的便知在历史里去寻些因缘。但是分析与追溯的程度也往往大有不齐。最笼统的是把盛衰隆替看作一种或几种社会制度直接的产

果。例如有人说中国人的积弱是专制政体的流毒,西洋人的强盛是基督教的赐赉之类。其次看出制度和民族兴衰的关系最多不过是间接的,有直接关系的乃是制度所养成的观念与习惯。再其次是发现一种流行较久的制度,往往可因婚姻与生殖的关系,而引起民族分子品性上的质与量的变化,而一个民族的命运,便视这种品性的优劣强弱为转移。“维新”以来,对于中国民族的积弱作解释的人很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十九不出上文所叙述的范围,而尤以用制度来直接解释的为多。自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学说流行以后,始有人引用间接的说法,认为经济制度形成种种思想与行为的习惯,而此种习惯便是中国一时不能振作的一个基本原因。但可惜他们仅仅着眼在经济的方面,失诸偏激武断,比较能就各种制度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作一番通盘的观察的人,实在还不多。其用所谓“文化或社会选择”的眼光来应付这个问题的,尤其是稀少了。

傅氏的见地有显而易见的几点好处。第一,他很注重心理的一方面。第二,他的历史的追溯与分析做得很远,居然提到了古代的气候与地理。第三,他所叙述的中国积弱的三个原因,我们在大体上都可以接受,也都可以找些事情来帮同他坐实。大平原的地面和人的行动,大河流域土壤的肥沃和衣食的供给,四至山海沙漠的险阻和生活的安定——都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地理环境内的民族,农业上的努力固不能没有,但是交通、武备、拓殖种种比较艰难的活动是比较不需要的。惟其不需要,大家才有余裕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下些功夫,结果,便是儒、老两大派的哲学思想。而这两派思想,一则注重人伦,一则主张无为,都是比较和物质的事物不发生复杂的关系的。傅氏所论第一个原因,大概是指这一类的史实吧。至于第二个原因,原是跟着第一个来的;和物质事物的接触既少,平日的理智生活,大部分是比较静止的思考(儒)和消极的感觉方面的领受(道),连其末流,在先圣昔贤既把一切天人的道理发明以后,所需要的只剩得一些记忆的活动。至于格物的理智生活,自观察、归纳,以至于原则的发见,自然是没有什么大用武之地了。我们

最后这几句话也就连带把傅氏第三个原因引伸了一下。

傅氏的分析里有一点我们不很明白。他所认识的中国民族心理在历史期内所发生的变迁,我们也认识。但是这种变迁是否只限于心理的表现了,抑或已经深入而成为性格的表现,他却没有说明(至少就报纸上所登载的而言)。这一点关系很大,不能不辨,假若只是心理的表现,那末,只要制度一变,风气一变,十年五年之后,便可以转换过来,向着比较适宜与健全的方向发展。假若已经成为性格的一部分,即多少已因生物淘汰的关系,而成为遗传倾向的一部分,那末,问题就比较复杂,决非短期的制度与风气的改变所能为力。我们在这些篇幅里历来所持“促民族达成年”的论调是根据这后一种看法的,不知傅氏与傅氏的听众诸君以为何如。

(原载《华年》第2卷第21期,1933年5月27日)

“节”与“周”

革新中国的方法真多。在文字方面的喊口号、贴标语、发宣言等等,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并且还有人做过一本专书,加以探讨(何容,《政治工作大纲》)。后来我们又发现第二类的方法,叫做“名目更换与部分分合”法(本刊第一卷第三十三期^①)。还有一种方法是完全在空间的变更上着想的,也可以归纳到这一类里去;例如国都,太平的时候从北平迁到南京,不太平的时候从南京迁到洛阳,或航空学校从杭州搬到开封,又从开封搬回杭州等等(见本期通讯^②)。

我们现在又发见第三类的革新中国的方法。这类方法并不在空间上用功夫,而在时间上翻花样,似乎更能够表现民族创造力的伟大。这一类不妨叫做“节与周”的方法。三月中有一个植树节,四月

① 指本书上文《名目更换与部分分合》。——编者注

② 见《华年》第2卷第21期,珠凤:《一笔百万以上的浪费》。但该文称该校系从杭州迁洛阳,再从洛阳迁回杭州。——编者注

里有一个儿童节,五月初有一个劳动节。最近过去的又有一个母亲节,方才成立的更有一个崇农节。至于“周”,又往往和某种运动联在一起。已经有相当历史的自然是“拒毒运动周”、“卫生运动周”之类。最近在热心的大学教授联合会的提倡之下,又产生了一个“学术救国运动周”。

一年五十三个礼拜,三百六十多天。要是“周与节”的方法确是有用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应当把应该兴办的事宜、和应该尊崇或爱护的人伦关系,好好的支配一下,算来大概还不至于支配不过来。学术可以救国,所以该有“运动”,可以有运动,所以便该有“周”,那末其余许多凡属可以救国的事业,都可以有“运动”,也都可以有“周”,但也应稍示限制,似乎以不出五十三个为宜,否则将有掩叠的弊病,民众将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节”比较好办,除了先烈的纪念日以及祖宗的生忌死忌以外,剩下的日子还多,有的并且不妨并在一天,例如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纪念与植树节。因为日子多,所以我们尽可以从容布置。既有劳动节、崇农节,为什么不可以有官吏节、学生节、商人节,以至于军人节?既有母亲节,为什么不可以有父亲节?既可以有儿童节,为什么不可以有老人节、看护节、奶妈节?我们提出奶妈节,有两层很重要的理由,一则以前人家过节祭祖,往往附带祭两种人,其一便是“家人仆妇”,桌上安放“一切家人仆妇之位”的牌位;再则奶妈之恩,往往不减于亲生的母亲,自昔已然,于今为烈。以前“母氏劬劳”,可以到一百分,现在往往只有五十分,或五十分不足,其余自然是奶妈的。所以我们以为至少奶妈节是应当添设的,并且这日子最好是母亲节的后一天。

“节”与“周”都明白规定以后,便不妨在新式的历本上逐一注明,来代替以前的杨公忌、吕祖先师生日、观音大士诞辰之类。那不是很显明的、很具体的一种进步么?几十年来的革新运动,有此一端,也就很可以自豪了。

(原载《华年》第2卷第21期,1933年5月27日)

日暮途穷的难民

首都军、政、警各机关商决对付灾民办法三项：一、向铁部交涉备车遣送现有灾民；二、嗣后过境灾民，一律不准登岸或下车，以维首都治安；三、通令各省县地方政府，不得擅发护照，使移民就食他省（五月二十三日，《申报》）。

我们读到这三个议决案，就立刻联想到两个譬喻。第一个是中国的，叫做“掩耳盗铃”，自己既听不到铃声，别人自然不会晓得。第二个是西洋的，叫做“埋头避难”，鸵鸟遇到危险，便把头钻到沙里，自以为千稳万妥了。据同一的理论，拒难民于千里之外，就等于没有难民。

联想以后又有两个感想。第一，普天之下，莫非国土，率土之滨，莫非国民，首都当局这一次应付难民的办法似乎根本不大赞成这立国三大要素之二。这倒很可以和东北的让渡互相发明，看作一条原则的两个大小不同的应用。第二，难民不但不是国民，并且也不是人。据说人是有衣、食、住、行四种基本权利的。做到了难民，衣、食、住，原早就发生问题，如今做中国的难民，连行都保不住了。以前没有了衣、食、住，至少还可以借行来谋三者的恢复，现在“行”不通了。呜呼，日暮途穷的难民！

（原载《华年》第2卷第22期，1933年6月3日）

著述难，出版亦不易

因《福地》那本小说而获得普利泽文学奖金的贝克夫人最近做过两件杀风景的事。第一件是长老会的脱离，我们已经谈过。第二件是这样的。最近美国出版人联合会举行大会的时候，邀她去赴一次宴会。席间她提起在她没有得普利泽奖金以前，她在出版人手中，所得到的是一种什么一种待遇。她说《福地》一书的稿子写完以后，三年

之中,转过二十家书局的手,竟没有一家肯承印;到了第二十一家才勉强接受。贝克夫人这一番话,原是为鼓励后起的作家说的,目的在教他们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志,半途而废,可不知宴席上同时也坐着许多书局的老板,据说其中那十八家便是当初看不上《福地》那本小说而把它退还给贝克夫人的。我们料想那十八位老板或老板的代表那时候多少有一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

上面这一段消息见五月二十三日的《大陆报》,中文各大报纸上却未见登出,我们在这里转载一下,一方面可以教中国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要因一二挫折而心灰意懒。一本赢得文学奖金的作品,在出版事业号称极发达的美国,犹且要经过二十次的尝试,才有人肯垂青,何况在出版事业十分幼稚的中国呢。一方面也要请从事出版业的人眼光要放得远些,审鉴要来得精些,不要因贪一时的小利,而牺牲了比较永久的大利,不要因巴结一二已经成名的作家,而埋没了许多有志著述的新进的人才。

(原载《华年》第2卷第22期,1933年6月3日)

“并不惊异”

中日停战消息传到日内瓦以后,国联并不惊异,“盖日本军队编制较佳,机械较优,中国欲在军事上维持对日抵抗,势有未能,灼然可睹。故停止流血之消息,为国联方面所欢迎”云(五月廿六日,《申报》)。

看了这一类国联方面渴爱和平的论调,我们心眼前面立刻就涌现着一个风烛残年的有一些嗣分关系的老祖母,眼看一个顽劣的孙子欺侮另一个比较忠厚的孙子,她老人家对于顽强的一方,既不能喝止,又不能施夏楚,连举起手里那根旱烟筒的力量,似乎都没有,只好在安乐椅上皱着眉,不住的叹息,夹上一些弟兄辈应该友爱、不应该打架一类修身教科书上常有而事实上她的孙儿们也早就读过的话。蓦地里双方偃旗息鼓、鸣金收军,她老人家便会笑逐颜开,叹口气说:

“好了，总算打停了，我早知道阿大不是阿二的手对手；不是对手也好，免得我再担什么心事；前几年各房不大闹过一次，弄得几乎家破人亡？”至于那顽强的孙儿究竟抢到了些什么，忠厚的孙儿损失了些什么，脸上有几处青肿，脚上有几处流血，她老人家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要图一个太平无事，眼睛前和气，耳朵边清静，心神上不烦躁，天大的的是非，也只好嘴里说说了。但她也未尝不替那忠厚的孙子担忧：他总是太忠厚了些，没有主意，没有胆量，也缺少能力；难道忠厚真是没有出息的别名么？没有出息，迟早要受人欺侮的，我又怎样顾到了许多。

（原载《华年》第2卷第22期，1933年6月3日）

东北沦亡的真朕兆

日本攫取中国东北四省以后，自知假若不作一些充实的拓殖工作，前途未必能保持它的“主人翁”的地位，所以年余以来，竭力鼓励它的国民向中国的东北移殖；深怕没有效力，又给他们种种金钱上与武装上的援助。所以攫夺的历史虽短，移民的数量似乎已很可观，至少报纸上络绎不绝的关于日本移民的新闻是这样说。

最近据哈瓦斯社东京来的电讯，我们知道又有一个很大的移民计划快要实现了。这计划预备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移民五十万人入中国的东北。（五月廿三日，《大陆报》）最初的动议据说是出自关东军事当局，但经关东军部、拓殖省、满铁会社、东洋拓殖会社、和伪组织协议之后，不久便可以成熟了。

实行这新计划的经济将由拓殖会社供给。拓殖会社原是一个半官式的组织，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它和中国的关系好比从前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印度一样。它这一次预备用两千万或三千万日圆的巨额资本来接济移殖的丁口，算是一种利息极微的贷款。伪组织一方面但须供给土地一万五千万至二万万公亩，约合二千四百四十万至三千二百五十五万华亩之谱。